

欧|亚|历|史|文|化|文|库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总策划
张余胜



黑鞑事略校注

周退密题



丛书主编 余太山
许全胜 校注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

欧亚历史文化文库

总策划 张余胜
兰州大学出版社



黑鞑事略校注

丛书主编 余太山

许全胜 校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鞑事略校注 / 许全胜校注. —兰州:兰州大学出版社,2014.3

(欧亚历史文化文库/余太山主编)

ISBN 978-7-311-04421-3

I. ①黑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蒙古族—民族历史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K28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44352 号

总 策 划 张余胜

书 名	黑鞑事略校注
丛书主编	余太山
作 者	许全胜 校注
出版发行	兰州大学出版社 (地址: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)
电 话	0931-8912613(总编办公室) 0931-8617156(营销中心) 0931-8914298(读者服务部)
网 址	http://www.onbook.com.cn
电子信箱	press@lzu.edu.cn
印 刷	天水新华印刷厂
开 本	700 mm × 1000 mm 1/16
印 张	20(插 7)
字 数	264 千
版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311-04421-3
定 价	66.00 元

(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、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)
淘宝网邮购地址:<http://lzup.taobao.com>

校注凡例

一、本書所用底本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一年壬寅(1542)姚咨藏鈔本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·史部》423冊533-541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
此本卷末有姚氏題記兩行云:“是編為廖生借王太史家藏宋刻本抄寄。嘉靖壬寅秋八月上旬。”并鈐“姚舜咨圖書”陰文印。按,姚咨,字舜咨,一字潛坤,號皇象山人、茶夢道人等,無錫人,明藏書家。卷首有“林集虛印”陰文印。按,林集虛,本名昌清,字喬良,號心齋,鄞縣人,室名藜照廬,民國藏書家,寧波古舊書店大西山房主人。此本蓋經林氏所藏。

二、參校其他鈔本有:

(1)上海圖書館藏李文田箋注本,今簡稱“李本”。

(2)上海圖書館藏沈曾植校注本,今簡稱“沈本”。沈本曾據李文田注稿本作校記,所云李本作某字,多與上海圖書館藏李文田箋注本相同,故不再重出,其不同者則予以保留。

(3)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內藤文庫所藏內藤湖南藏鈔本(編號為內藤一119)。此本原為羅振玉舊藏,今仍稱“羅本”。

(4)日本那珂通世藏本。此原本未見,內藤湖南以此本校勘過錄異文與上揭自藏本上。那珂本原為陳毅(字士可)舊藏,內藤稱此為“陳本”,今仍之。

三、參校刻本有:

(1)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(1908)胡思敬刊《問影樓輿地叢書》第1集仿聚珍版排印本,簡稱“問影樓本”。按,此本書眉有箋注,經筆者與上海圖書館藏李文田《黑韃事略箋注》鈔本(簡稱“李本”)校核,實即李氏注,兩者內容大體相同,僅有數條注問影樓本缺載。其卷末附錄李

文田、熙元(字太初)、胡思敬題跋,并附胡氏據曹元忠《蒙韃備錄校注》所引《黑韃事略》文所作校勘記。此本後又收入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(1935—1937)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《叢書集成初編》史地類。胡氏校記簡稱“胡校”。《黑韃事略》原文上圖鈔本與問影樓本相同時,校記僅稱“李本”;如有不同時,則分別說明。

(2)民國十五年(1926)羅振玉刊《六經堪叢書》(東方學會排印本),簡稱“六經堪本”。此本後附章鈺過錄曹元忠以章氏藏本與舊鈔本互勘所作校記,今將校記所據章氏藏本簡稱“章本”。曹氏校語則稱為“曹校”。

(3)民國乙丑年十二月(1925—1926)王國維作《黑韃事略箋證》,後收入《王國維遺書》,末署“甲戌(引按,即民國二十三年[1934])門人趙萬里以天一閣舊藏姚舜咨校本覆勘訖”,則今所見《黑韃事略箋證》所用文本實已兼天一閣本之長,今簡稱“王本”。

(4)明唐順之《武編》(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子部兵家類第727冊)、明茅元儀《武備志》(明天啟刻本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936—966冊)、明范景文《戰守全書》(明崇禎刻本,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子部兵家類第36冊)中皆曾引是書若干段落,書名題作《黑韃遺事》,茲亦取作校勘之資。按,《黑韃遺事》與《黑韃事略》非一書,據《武編》前集卷1所引,《黑韃遺事》中有《松漠紀聞》文字,可知《黑韃遺事》蓋匯輯宋人筆記中有關“黑韃”資料而成者,其書今已佚。

四、集注共采三家：

(1)李文田箋注,上海圖書館藏鈔本;并參考問影樓本李氏眉注,稱“○李曰”。

(2)沈曾植校注,上海圖書館藏稿本,稱“○沈曰”。

(3)王國維箋證,《王國維遺書》本,稱“○王曰”。王氏箋證多書於每小段之後,茲據所箋內容移至相應原文條目下。所引典籍文字皆經核對,如有誤字,則將正字置於圓括號“()”內注於其後,不徑改以存其舊。

三家注外,筆者新註以“○勝案”為識。

五、附錄收入前人題跋及研究資料。

定六年癸巳，史嵩之爲京湖制置使，與蒙古會兵攻金。會蒙古遣王楫來通好，因假伸之朝奉大夫京湖制置使參議官，往使。以是歲六月偕王楫自襄陽啟行，至明年甲午二月始見蒙古主於行帳。尋即遣回，以七月抵襄陽。計在途者十三月。因取所聞見及往復問答，編次紀錄，以爲此書。……又《宋史》載伸之出使在紹定五年十二月，而此《錄》實以六年六月出疆，皆當以此錄所紀爲得其實。

又《湛淵靜語》卷2云：

《使燕日錄》載紹定癸巳北朝遣王楫來通好，朝廷劄京湖制司就差官鄒伸(伸)之等六員使北朝審實，於次年六月回抵汴。^[1]

據此可知鄒伸之初使時偕隨員六人(彭大雅當爲其中一員)，於紹定六年癸巳(1233)六月由襄陽啟程，第二年即端平元年甲午(1234)二月抵達蒙古汗帳，見太宗窩闊台。伸之一行隨即返程，于同年六月至汴，七月抵襄陽。^[2]

案，張政烺先生所考甚確，但學者論及彭大雅出使事，或有用王國維壬辰之說者^[3]，故特爲拈出。不過最先注意鄒氏《使北日錄》這條材料的倒並非張氏，而是晚清蒙元史地學者李文田(1834—1895)。據李氏《黑韃事略箋注》抄本“霰至草地時立金帳”條眉注云：

案，鄒伸之撰《使北日錄》一卷，事在理宗紹定六年。此書存目在《提要》卷五十二雜史類。^[4]

是李氏應已考知鄒伸之初使蒙古在紹定六年。

二、《黑韃事略》的版本與中國學者的早期研究

《黑韃事略》流傳頗罕，原刊本早已不存。目前所見最早的版本爲

[1] 見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子部雜家類。

[2] 參見《張政烺文史論集》，96—97頁。

[3] 如陳得芝主編《中國通史》第8卷《中古時代·元時期(上)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，15—16頁)。不過，去年陳氏出版所著《蒙元史研究導論》(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，26頁)，已糾正此誤。伯希和也從王說，見其《評王國維遺書》“《黑韃事略箋注》”條(馮承鈞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》，商務印書館1962年，55頁)。

[4] 此條注文見上海圖書館藏李氏《黑韃事略箋注》抄本，胡思敬所輯《問影樓輿地叢書》本《黑韃事略》書眉李文田注無此條。

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)姚咨跋抄本。據姚跋(見本書附錄)這個抄本是據宋刻本抄的,此本爲後來衆多抄本之祖。^[1]清光緒十六年庚寅(1890)春,李文田在京師廠肆得一抄本,此書原爲張蓉鏡(1803—?)舊藏本^[2],李氏跋云:

《黑韃事略》一卷,宋彭大雅撰、徐霆疏證而成此書。霆南宋理宗時人,嘗奉使蒙古,歸而編其風土爲此書。據其自跋,尚有《北征日記》一書,今已久佚,即此書亦爲藏家所罕有矣。姚咨跋稱嘉靖丁巳鈔自太史王懋中家云。光緒庚寅,見此於廠肆,亟收之,以慰物聚之好爾。

同年繆荃孫(1844—1919)在南方也購得一舊抄本攜歸京師。^[3]沈曾植(1850—1922)借抄繆本後,又校以李本,並作箋注。沈氏稿本今藏上海圖書館,有題跋云:

此本借抄于繆小山編修,編修歸自江南,新得書也。李詹事春間從廠肆得一舊抄本,復借之校一過。繆本勝李本,然所出之源不同。繆本誤脫而李本是者,亦若干條,此書大略可讀矣。

案,據繆荃孫《藝風老人日記》,繆氏於庚寅五月十二日(1890年6月28日)抵京,二十九日(7月15日)與沈曾植等會面。六月三、四、五日(7月19、20、21日),繆氏自校《黑韃事略》。六月九日(7月25日)沈曾植來借《黑韃事略》。六月二十三日(8月8日)繆荃孫約沈曾植等聚飲。二十四日(8月9日)繆氏復借李文田本校勘。據此可知二十三日沈繆見面時,沈已將繆書歸還,則沈曾植校《黑韃事略》當在光緒十六年六月九日至二十三日(1890年7月25日至8月8日)間。沈氏開始作箋注當也在是年。

[1]參見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史部雜史類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,249頁。案,國圖此本嘉靖壬寅(二十一年,1542)姚咨跋爲他本所無,其他諸本有嘉靖丁巳(三十六年,1557)姚咨跋,但無壬寅姚跋。

[2]繆荃孫《藝風老人日記》庚寅六月二十四日條云:“謁順德師,……借《黑韃事略》張蓉鏡舊藏本回”(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)。案,張蓉鏡,字芙川,江蘇常熟人,清藏書家(參見葉昌熾《藏書紀事詩》卷5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,579—581頁)。

[3]此本見《藝風藏書記》卷3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,64頁。

從李文田與沈曾植的跋語推測，他們大約同時在作《黑韃事略》的箋注。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（1908）胡思敬（1870—1922）刊刻《問影樓輿地叢書》第1集^[1]，收有1種舊鈔本《黑韃事略》，書眉有箋注，書末除李文田跋外，還有熙元（1864—1900）^[2]跋及胡氏自跋兩篇：

丁酉（1897）正月，達甫弟得鈔本於厥肆，余愛其敘事詳實，命書僕翟浦錄副藏之。此書惟《述古堂》、《持靜齋》二目著錄，他不多見，誠秘笈也。太初記。

右書自元以來展轉傳抄，罕見刻本。明人號搜輯古今佚乘，考諸家叢目，亦未著錄。唯吳縣曹中翰注《蒙韃備錄》徵引十餘條，未知所據何本，就其所引者兩相校對，各有脫誤。曹注沒去彭大雅之名，竟以此書為徐霆所著。度其所見，亦非校刻精本可知。此本熙太初祭酒家故物。祭酒殉難後，余遊曉市得之。其李侍郎所跋原書，則不知流落何所，侍郎攻西北輿地學最專，書眉評語，考證精博，足與徐疏互相發明，疑即侍郎之筆，存而不削，異時當與《元秘史》、《西遊錄》注並傳。末附校勘記，多系以意懸度，不敢徑改，用存古書之舊，讀者審之。光緒戊申（1908）秋九月，新昌胡思敬跋。

案，筆者將此書的李跋及眉批與上海圖書館藏李氏箋注抄本校核，發現除抄本眉批有兩條失載外，幾乎全同。^[3]可知胡氏刊本所依據的實為李文田注本的另一個抄本。蓋李氏於1895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逝世後，其注本流入厥肆，至1897年（光緒二十三年）書為熙元之弟所得，熙元命人錄一副本。熙氏庚子殉難後，藏書復流出，乃為胡思敬所得。胡氏跋“書眉評語，考證精博，足與徐疏互相發明，疑即侍郎之筆，存而不削”是很有見地的。伯希和（1878—1945）《評王國維遺書》“黑韃事

[1]清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新昌胡氏京師仿聚珍版排印本。又見《叢書集成初編》史地類，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（1935—1937）商務印書館（上海）排印本。後附胡思敬校勘記。

[2]熙元，字太初，號吉甫，滿洲正白旗人。見孫雄《舊京文存》卷3《紀略》（參見江慶柏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，812頁）。

[3]上圖藏李文田箋注抄本首條眉批有“田案”字樣，而胡刻本無此二字，故胡思敬不能十分肯定所刻本注是李氏所作。而內藤湖南蓋據胡思敬跋語，則徑稱《問影樓輿地叢書》本有李文田眉批，見其《中國史學史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，324頁）。

略箋證”條云：

一九〇八年有活字本，訛誤甚多，收入胡思敬《問影樓輿地叢書》中。胡氏所據者是一近代抄本，而此抄本又間接出於姚咨一五五七年抄本。箋注佳者不少。王氏所據本，亦出姚咨本，然未言出處，要非胡思敬所據之本。……徐震疏後云：“此亦止述大略，其詳則見之《北征日記》。”王氏箋證未及此書，然胡思敬本有李文田跋，視此《北征日記》為徐震之別一記錄，余以其說不誤。按舊《說郛》本有《北征記》，前此未能考得其撰人（參看《通報》一九二四年刊二〇五頁），今以此書應是《北征日記》。^{〔1〕}

可知伯氏于李文田之說評價頗高，不過他認為《北征日記》即《說郛》中的《北征記》則未必正確^{〔2〕}。而王國維所據本確如伯氏所云是另一本，王氏1925年12月16日（民國14年，十一月一日）致羅振玉函略云：

公前所印《黑韃事略》，如有存者否，乞賜一本。……李文誠（案即李文田）《元秘史注》紕繆甚多，與其所著他書無異，培老（即沈曾植）乃盛稱其人，殊不可解。^{〔3〕}

案，據此函知王國維《黑韃事略箋證》所據之本應是羅振玉印本，此本1926年又由東方學會重印，收入《六經堪叢書》。顯然，伯希和僅見胡思敬刊本而未見羅氏刊本。王國維對李文田評價甚低，他未及參考胡氏刻本中的李注，所論不如伯希和公允。

1926年王國維作《黑韃事略箋證》，其中多次引用沈曾植注，惜王氏當時未見李文田注，李注精彩處可從下舉之例得其一斑。《黑韃事略》“其賦”條有“置蘸之法”，沈注云：

置蘸即置站也，蘸字獨見於此。

王國維《箋證》引沈氏說稱是^{〔4〕}，他在1926年9月14日（八月初八日）

〔1〕見馮承鈞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》，55—56頁。

〔2〕《北征記》見陶宗儀輯、張宗祥重校《說郛》（100卷本）卷4，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商務印書館（上海）排印本。此本收入《說郛三種》第1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。

〔3〕見《王國維全集·書信》，中華書局1984年，425頁。又見《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》，東方出版社2000年，649—650頁。

〔4〕見《王國維遺書》第8冊，220頁。

致神田喜一郎函中提及此事：

《親征錄校注》甚為草率，……此書印刷垂成，已發見當增訂處不止三四。至《蒙韃備錄》及《黑韃事略》二種增訂之處尤多，頃見沈乙庵先生校本，釋《事略》中蘸字為站之異譯，此條甚佳。^{〔1〕}

顯然《箋證》所引是後來王氏見到沈曾植注增補進去的。沈注僅一句話，博得王國維如此稱許，他不知道李文田也早已有此見解，而且比沈注論證更充分。李注云：

蘸，即“站”字之借音，本借“占”字，其後或作“駢”或“站”，皆俗字。明人撰《元史》用“立”旁“站”字以後，此字有一定之用矣。周密《癸辛雜識》及陶宗儀《輟耕錄》皆有“站”字。又《元史·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列傳》：“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，責太保劉秉忠曰：‘汝何為不諫？今軍蘸已定，奪之可乎？’”^{〔2〕}是元初不專用“站”字，亦作“蘸”字也。

沈曾植借李文田藏本校過，他們作注約在同時，此見解可謂不謀而合。可惜這條注僅見於上圖所藏李注鈔本，而不見於胡思敬刻本。不過即便胡本有，王氏當時沒有看到，也就無從參考了。當然，正如伯希和已指出的那樣，王國維所作箋證“豐富精密，始終如一”^{〔3〕}，雖然有個別不足之處，仍是佳作。

三、沈曾植箋注未刊本的價值

1890年（光緒十六年）夏，沈曾植借抄繆荃孫藏本後，又校以李文田藏本。據其書眉批註筆跡看，其注釋是不斷增補的，非一時所成。沈曾植《黑韃事略箋注》是目前所知最早的《黑韃事略》注本之一，有不同于李文田注的獨特價值，也受到後來王國維的重視。伯希和對胡刻本

〔1〕見《王國維全集·書信》，442頁。

〔2〕李注引文有節略，原文參見《元史·後妃傳》，中華書局1976年，2871頁。

〔3〕見伯希和《評王國維遺書》“《黑韃事略箋注》”條（馮承鈞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》，56頁）。

的箋注有較好的評價，雖然他當時不知道這就是李文田所注。伯希和在書評中也因王氏箋證引沈曾植說而提及沈氏，他曾與沈氏有過交往^[1]，但因未見沈注全貌，沒有加以任何評說。^[2]

沈氏箋注中除上揭為王國維所徵引者之外，還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。他對《黑韃事略》這部重要的行記所涉及的歷史人物，種族、地理名稱，蒙古風俗習慣，以及法律、商業制度等諸大端都作了開創性的研究，茲略舉數例。

(1)“覘見故姑之制”條注云：

○《至元譯語》：故故曰播庫脫。然則故故非蒙語也。○《事林廣記》：固姑，韃人、回回婦女戴之，以皮或糊紙為之，朱漆剔金為飾。

案，此條李文田注云：

故姑，蒙古冠名也。《蒙韃備錄》作“顧姑”，元丘處機《西遊記》作“故故”，明葉子奇《草木子》作“姑姑”，皆此物也。又《輟耕錄》二十二卷云：“承旨阿目茄八剌死，……帶罽罽娘子十有五人。”^[3]

沈曾植和李文田是國內最早注意罽罽冠問題的學者。後來王國維《蒙韃備錄箋證》“顧姑冠”條引《長春真人西遊記》、楊允孚《灤京雜詠》、《析津志》，另外其《黑韃事略箋證》“故姑”條、《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》“故故”條，也都有考證。^[4] 沈注向未刊佈，而載有李注的《問影樓輿地叢書》本雖早已印行，學者似多未注意，故學術界至今論及此問題均首推王氏^[5]，理應更正。

(2)“自韃主以下，只是以銀與回回，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”條注略

[1] 參見許全勝《沈曾植年譜長編》，中華書局2007年，425—426頁。

[2] 見伯希和《評王國維遺書》（馮承鈞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》，56頁）。伯氏文中把沈曾植的生卒年誤作1853—1922，應作1850—1922。

[3] 見《問影樓叢書》本第三葉。

[4] 見上揭《王國維遺書》第8冊，186、209、484頁。

[5] 參見方齡貴《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》“罽罽”條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年，304頁；方齡貴《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》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、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，317頁；劉曉《元史研究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，185頁。

云：

○自韃主以下，皆以銀貸回回，令貿易以納息。此即元世所謂幹脫錢也。……○《至元譯語》：買賣人曰“或旦督赤”。“或旦督”即“幹脫”也。

案，“幹脫”一詞源於突厥語 *ortaq / ortoq*^[1]，本意為“合夥”，轉義為商人。沈曾植指出“幹脫”即《至元譯語》君官門的“或旦督”^[2]，似未經他人道及。他是較早關注這種元代廣為流行的商業行為的學者之一^[3]。王國維《箋證》也過錄此條注。^[4]

(3)“成吉思立法，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，不許有妬忌者”條注云：

《本紀》太宗六年，大會諸王百官於達蘭達葩之地，所頒條令有婦人“妒者，乘以驪馬（牛），徇部中論罪，即聚財為更娶”一條。嘗疑此細事，何汲汲於大札撒中言之，讀此乃知其故也。

案，此條有關法律制度，頗有價值。王國維《箋證》云：“蒙古法，夫人妬者離之。”也引《元史·太宗紀》六年所載條令，而未提及沈注。^[5]

(4)“厥相王賢佐，年餘九十，有知來之明”條注略云：

○影元本《中州樂府》王元佐小傳：賢佐，一名元佐，名澹，咸平人。……按《[金]史·宣宗本紀》貞祐二年正月：“乙酉，征處士王澹，不至。”四年三月：“己卯，處士王澹以右諫議大夫復遷中奉大夫、翰林學士，仍賜詔褒諭。”

案，沈注避清諱，“玄佐”作“元佐”。屠寄《蒙兀兒史記》卷31《蒲鮮萬奴傳》附《王澹傳》“王澹字賢佐”注：“名依《金史》本紀，字依《黑韃事

[1] 見伯希和《〈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〉評注》注18（馮承鈞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》，商務印書館1962年，26頁）。

[2] 參見賈敬顏、朱風：《蒙古譯語女真譯語匯編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，15頁。

[3] 李文田注引《元史·耶律楚材傳》、《太宗本紀》等，也注意及此。王國維《箋證》則引《元文類》卷57《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》，與李注實相合。關於幹脫與幹脫錢的研究，參見方齡貴《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》，27-32頁；又劉曉《元史研究》，158-159頁。

[4] 見《王國維遺書》（第8冊，223-224頁），但王氏未錄沈注引《至元譯語》“或旦督”等語。

[5] 見《王國維遺書》第8冊，244頁。

略》”。^{〔1〕} 王國維《箋證》也引元好問《中州集》卷 11《王賢佐小傳》，并云：

屠靜山作《蒲鮮萬奴傳》，已疑此書之“王賢佐”即《金史》之“王滄”。今據《中州集》乃得定之。^{〔2〕}

不知沈注早已定之矣。

四、國外學人的貢獻及中外學術交流

清季研究蒙古史爲一時學術風尚，中日兩國學者都對搜求與研究蒙古史料表現出極大的熱情。日本學者專治《黑韃事略》的，有著名蒙古史家箭內互（1875—1926），他在 1922（大正十一年）印有《黑韃事略》校訂本。^{〔3〕} 但此書非正式出版物，可能印數很少，因此即使在日本現在也較難見到。京都大學內藤文庫藏有一冊（編號爲“內藤 - 118”）^{〔4〕}，據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藏鈔本校印，有箭內互題跋，末署：

大正十一年九月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研究室ニ於いて。箭內互識す。

上引 1926 年 9 月 14 日王國維至神田喜一郎札略云：

至《蒙韃備錄》及《黑韃事略》二種則當增訂之處尤多。頃見沈乙庵先生校本，釋《事略》中蘸字爲站之異譯，此條甚佳。不知箭內博士本將來能否印行？

箭內互當時已病逝，其校訂本雖印出，但未公開發行，故王氏有此問。王國維《黑韃事略箋證》“東北曰妮奴曰那海益律于”條注云：

沈乙庵先生曰：“益律于”疑“益律干”之誤。《元史》本紀五：“至元元年吉里迷來言，其國東有骨廐（嵬）、亦里干兩部，歲來侵，故征之。”亦里、益律，與今言烏拉、鄂倫同，皆古挹婁音轉也。

〔1〕見屠寄《蒙兀兒史記》卷 31，中國書店 1984 年，六葉反/284 頁；元脫脫等撰《金史》卷 14《宣宗紀》上，中華書局 1975 年，303、312、317 頁。

〔2〕見《王國維遺書》第 8 冊，252—253 頁。

〔3〕參見箭內互《蒙古史研究》附錄書目，昭和 41 年（1965）版。

〔4〕感謝余欣君代查內藤文庫收藏情況。

案,沈先生以“益律干”爲“益律干”之訛是也,謂“益律干”爲“挹婁”之音轉則非。益律干,《秘史》作“亦兒堅”,《親征錄》作“亦兒干”,乃蒙古語百姓之義。“那海益律干”、“斛速益律干”謂狗國民、水國民,猶林木中百姓之“槐因亦兒堅”或“火因亦兒干”也。日本箭內博士所見本,“益律干”作“益律子”,以“益律子”爲蒙古語“奧魯思”之對音,不如讀爲“益律干”之善也。^[1]

可見或許通過神田的寄贈,王國維顯然已經參考過此書。

京大內藤文庫中還有一冊羅振玉舊藏《黑韃事略》鈔本,編號爲“內藤-119”。^[2]書眉有內藤湖南(1866—1934)手書校記。書末有內藤1903年所作跋兩行:

此書壬寅歲游清國時得之羅叔蘊,歸後借那珂先輩藏本對校一過。那珂本得之清國陳士可,所以稱陳本。癸卯四月念九,炳卿。

據此可知此抄本爲內藤1902年來華時羅振玉所贈,歸國後第二年,他從日本近代蒙古史開山那珂通世(1851—1908)處借到原爲陳毅(字士可,1873—?)所藏的另一抄本作了校勘。跋文雖短,卻是近代中日兩國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生動寫照。^[3]

德國學者譯注《黑韃事略》的工作始於著名漢學家、蒙古學者 Erich Haenisch (1880—1966),曾師事他的中國學者姚從吾(1894—1970)也參與了德譯本的前期工作。1980年,Haenisch的弟子 P. Olbericht 與 E. Pinks 合作出版了《〈蒙韃備錄〉與〈黑韃事略〉譯

[1] 見《王國維遺書》第8冊,253頁。

[2] 感謝吳念庵丈惠示內藤湖南藏本的電子圖像版。

[3] 內藤湖南對蒙元史甚爲關注,多方搜羅史料,1902年文廷式(1856—1904)就曾將蒙文《元朝秘史》12卷鈔寄給他(參見《文廷式集》上冊,中華書局1993年,706頁)。內藤還曾將自己校正過的《蒙古源流》抄了一部送給沈曾植,並希望得到沈氏所作《蒙古源流事證》(參見內藤湖南《中國史學史》,325—326頁)。

注》^{〔1〕}，譯文與註釋均為學界稱道。^{〔2〕}

蘇聯蒙古學家蒙庫耶夫(Мункуев, Николай Цырендоржиевич, 1922—1986)也曾研究過《蒙韃備錄》和《黑韃事略》，并有俄文翻譯與註釋本行世。^{〔3〕}

五、本書的校注工作

鑒於《黑韃事略》這部重要的著作一直未有標點本行世，因此筆者不揣譾陋，多年前就想做一新的校注本，以便學者翻檢。本書校勘方面，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一年壬寅(1542)姚咨跋抄本為底本，參校李文田、沈曾植、日本內藤湖南等人所藏抄本及胡思敬、羅振玉、王國維等人的刊本，另外還參考了明人所著《武編》、《武備志》、《戰守全書》等書的相關引文為校勘之資。註釋方面，則先輯錄李文田、沈曾植、王國維三家注於相關段落之下，然後附以筆者的新注。具體版本情況可參見本書校注凡例。

筆者的新注，在史實地理、人物傳記、名物制度、宋元語詞等方面作了相應的補充，參考了許多古籍資料和中外學人的相關研究成果。但由於筆者學殖淺薄，見聞狹隘，一定存在不少失誤，尚祈讀者不吝賜教，以便將來修訂，臻於完善。

〔1〕Olbricht, Peter und Pinks, Elisabeth. *Meng-Ta Pei-Lu und Hei-Ta Shih-Lüeh*, *Chinesische Gesandtenberichte über die frühen Mongolen 1221 und 1237*, nach Vorarbeiten von Erich Haenisch und Yao Ts'ung-wu, Asiatische Forschungen, band 56. Wiesbaden; Otto Harrassowitz, 1980.

〔2〕參見 Igor de Rachewiltz, "On a Recent Translation of the Meng-ta Pei-lu and Hei-ta Shih-lüeh: A Review Article",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35 (1983), pp. 571 - 582 及《華裔學志》同期 Thomas T. Allsen 的書評(pp. 656 - 660)。

〔3〕40 參見陳得芝：《蒙元史研究導論》，259 頁。

《欧亚历史文化文库》学术委员会

主 任

陈高华

委员（按拼音顺序）

定宜庄	韩 昇	华 涛	蓝 琪
李锦绣	李勤璞	厉 声	林梅村
林悟殊	刘欣如	刘迎胜	卢向前
罗 丰	马小鹤	梅维恒	牛汝极
潘志平	荣新江	芮传明	沈卫荣
汪受宽	王邦维	王冀青	王 颀
王希隆	王 欣	魏存成	徐文堪
杨 军	于志勇	郑炳林	

《欧亚历史文化文库》出版委员会

主 任

张余胜

副主任

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
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

委 员(按拼音顺序)

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
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
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
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
夏 玲 邢 玮 张东林